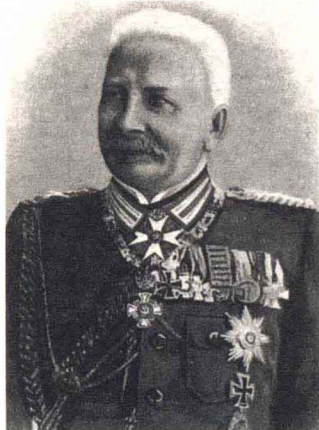


中德文化丛书
叶隽主编



瓦德西在回忆录中对八国联军在华侵略行径进行了苍白的辩解，但却无意中将八国联军的暴行暴露无遗。他对中国珍贵物品被抢被毁表示遗憾，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劫掠。

瓦德西庚子回忆录

八国联军统帅拳乱笔录

◎(德)瓦德西 著

◎秦俊峰 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瓦德西在回忆录中对八国联军在华侵略行径进行了苍白的辩解，但却无意中将八国联军的暴行暴露无遗。他对中国珍贵物品被抢被毁表示遗憾，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劫掠。

瓦德西庚子回忆录

八国联军统帅拳乱笔录

◎(德)瓦德西 著

◎秦俊峰 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德西庚子回忆录/(德)瓦德西著;秦俊峰译.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5

(中德文化丛书)

ISBN 978-7-5334-6042-6

I. ①瓦… II. ①瓦… ②秦… III. ①八国联军—侵华—史料

IV. ①K256.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8001号

瓦德西庚子回忆录

(德)瓦德西 著 秦俊峰 译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27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出版人 黄旭

发行热线 0591-87115073 83752790

印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大兴黄村镇三间房村委会北500米 邮编:102600)

开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04千

插页 2

版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6042-6

定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部(电话:010-62024258)联系调换。

“中德文化丛书”总序

叶 隽

一、中德两国在东、西方（亚欧）文化格局里的地位

华夏传统，源远流长，浩荡奔涌于历史海洋；德国文化，异军突起，慨然跃升于思想殿堂。作为西方文化、亦是欧陆南北对峙格局之重要代表的德国，其日耳曼统绪与位于亚洲南部的印度文化颇多血脉关联，而与华夏文明恰成一种“异体”态势，这可谓“相反相成”之趣味。

作为欧陆南方拉丁文化代表之法国，恰与中国同类，故陈寅恪先生谓：“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诚哉是言，在西方各民族文化中，法国人的传统、风俗与习惯确实与中国人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当然也不排除文化间交流的相互契合：诸如科举制的吸纳、启蒙时代诸子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接受等皆是。如此立论，并非敢淡漠东西文化的基本差别，这毕竟仍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分野；可无论是“异于中国”，还是“趋于中国”，均见钱锺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言不虚。

在亚洲文化（东方文化）的整体格局中，中国文化属于北方文化，印度文化才是南方文化。中印文化的交流史，实际上有些类似于德法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属于地缘关系的亚洲陆地上的密切交流，并由此构成了东方文化的

核心内容。因为，两种具有互补性的主导性文化，往往能够推动人类文明的较快推进，这可能是一个基本规律。遗憾的是，由于地域太过辽阔，亚洲意义的南北文化交流有时并不能相对频繁地形成两种文化之间的积极互动态势。

西方文化发展到现代，欧洲三强英、法、德各有所长，可若论地缘意义上对异文化的汲取，德国可拔得头筹。有统计资料表明，在将外语文献译成本民族语言方面，德国居首。其中对法国文化的吸收更成思想史上一大公案，乃至一口流利法文的歌德那一代人，因“过犹不及”而不得不激烈反抗法国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无论正反事例，都足证德意志民族“海纳百川”的学习情怀。就东方而言，中国文化因其所处地理中心位置，故能得地利之便，尤其是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汲取，不仅是一种开阔大度的放眼拿来，更兼备一种善择化用的创造气魄，一方面是佛教在印度终告没落，一方面却是禅宗文化在中国勃然而起。就东方文化之代表而言，或许没有比中国更加合适的。

中德文化关系史的意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全局眼光中才能特别凸显出来。即这是一种具有两种基点文明代表性意义的文化交流，而非仅一般意义上的“双边文化关系”。也就是说，这是东西文化内部的两种核心子文化的交流，即作为欧洲北方文化的条顿文明与亚洲北方文化的华夏文明之间的交流。这样一种主导性的文化间的交流，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二、作为文明进程推动器的中德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的“超人三变”

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是文明进程的推动器。诚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这一论断，也早已为第一流的知识精英所认知，譬如歌德、席勒那代人，非常深刻地意识到走向世界、汲取不同资源的重要性，而中国文化正是在那种背景下进入了他们的宏阔视阈。当然，我们要意识到的是，对作为现代世界文明史巅峰的德国古典时代而言，文化交流的意义极为重要，但作为主流的

外来资源汲取，是应在一种宏阔的侨易学视域（此概念作者将专文论述，此处不赘）中去考察的，这一点歌德总结得很清楚：“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此处涉及文化交流的规律性问题，即如何突出作为接受主体的主动选择性，若按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不仅是中國精英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资源的态度，推而广之，对各国择取外来资源与创造本民族之精神文化，皆有普遍参照意义。总体而言，德国古典时代对外来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汲取与转化创造，是一次文化交流的质的提升。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其意义在此。

至于其他方面的双边交流史，也同样重要。德印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德国学者涉猎较多且深，尤其是其梵学研究，独步学林，赫然成为世界显学，正与其世界学术中心的地位相吻合。而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的第一流学者，如陈寅恪、季羨林等就先后负笈留德，所治正是梵学，亦可略相印证。中法文化交流史同样内容极为精彩，由启蒙时代法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汲取与借鉴到现代中国发起浩浩荡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其转易为师的过程同样值得深入探究。总之，德、法、中、印这四个国家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应当归入“文化史研究”的中心问题之列。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或多或少会将关注的目光更投入到中国问题本身。必须加以区分的是所谓“古代中国”、“中世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概念分野。“古代中国”相当于传统中国的概念，即文化交流与渗透尚未到极端的地步，尤以“先秦诸子”思想为核心；“中世中国”则因与印度佛教文化接触，而使传统文化受到一种大刺激而有“易”，禅宗文化与宋儒理学值得特别关注；“现代中国”以基督

教之涌入为代表，西学东渐为标志，仍在进程之中，乃是以汲取西学为主的广求知识于世界，可以“新儒家”之生成为关注点。经历三变的中国，“内在于中国”为第一变，“内在于东方”为第二变，“内在于世界”为第三变，三变后的中国，才是具有悠久传统而兼容世界文化之长的代表性文化体系。

先秦儒家、宋儒理学、新儒家思想（广义概念）的三段式过渡，乃是中国思想渐成系统与创新的标志，虽然后者尚未定论，但应是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思想的努力方向。而正是这样一种具有代表性且兼具异质性的交流，在数量众多的双边文化交流中，具有极为不俗的意义。张君勱在谈到现代中国的那代知识精英面对西方学说时的盲目时有这样的描述：“好像站在大海中，没有法子看看这个海的四周……同时，哲学与科学有它们的历史，其中分若干种派别，在我们当时加紧读人家教科书如不暇及，又何敢站在这门学问以内来判断甲派长短得失，乙派长短得失如何呢？”这其中固然有个体面对知识海洋的困惑，同时也意味着现代中国输入与择取外来思想的困境与机遇。王韬曾感慨地说：“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不仅表现在政治军事领域如此，在文化思想方面亦然。而当西方各强国纷纷涌入中国，使得“西学东渐”与“西力东渐”合并东向之际，作为自19世纪以来世界教育与学术中心场域的德国学术，则自有其非同一般的思想史意义。实际上，这从国际范围的文化交流史历程也可看出，19世纪后期逐渐兴起的三大国——俄、日、美，都是以德为师的。

故此，第一流的中国精英多半都已意识到学习德国的重要性。无论是蔡元培强调“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而先赴青岛习德文”，还是马君武认为“德国文化为世界冠”，都直接表明了此点。至于鲁迅、郭沫若乃至蒋介石等都有未曾实现的“留德梦”，也均可为证。中德文化研究的意义，端在于此，而并非仅仅是众多“中外文化交流史”里的一个而已。如果再考虑到这两种文化是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方文化之个体（民族—国家文化），那么其意义就更显突出了。

三、在“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关联背景下理解中德文化关系的意义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画地为牢，因为只有将视域拓展到全球化的整体联动视域中，才能真正揭示规律性的所在。所以，我们不仅要谈中国文化的西传，更要考察波斯—阿拉伯、印度、日本文化如何进入欧洲（西方）。这样的东学，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东学。当东学西渐的轨迹，经由这样的文化交流史梳理而逐渐显出清晰的脉络时，中国文化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比较格局中，才会更清晰地彰显其思想史的意义。这样的工作，需要学界各领域研究者的通力合作。

而当西学东渐在中国语境里具体落实到20世纪前期这辈人时，他们的学术意识和文化敏感让人感动。其中尤其可圈可点的，则为1930年代中德学会的沉潜工作，其标志是“中德文化丛书”的推出，这其中不仅有《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这样的系统翻译工程，也包括《中德学志》等刊物的学术功用……至今检点前贤的来时路，翻阅他们留下的薄薄册页，似乎就能感受到他们逝去而永不寂寞的心灵。昔贤筚路蓝缕的努力，必将为后人开启接续盛业的来路。光阴荏苒，竟然轮到了我们这代人。虽然学养有限、社会功利，但对前贤的效慕景仰之心，却无有或减。如何以一种更加平稳踏实的心态，继承前人未竟之业，开辟后世纯正学统，或许就是历史交给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不过我仍要说我们很幸运，当冯至、陈铨那代人不得不因了民族战争的背景而辗转颠沛于流离战火中时，一代人的事业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宣告中断”时，我们却还有可能静坐于书斋之中。虽然市场经济的大潮喧嚣的似也要推翻学院里“平静的书桌”，但毕竟书生还有可以选择的权利。在清苦中快乐、在寂寞中读书、在孤独中思考，这或许，已是时代赠与我们的最大财富。

所幸，在这样的市场大潮下，能有出版人的鼎力支持，使这套“中德文化丛书”得以推出。我们不追求一时轰轰烈烈吸引眼球的效应，而希望

能持之以恒、默默行路，对中国学术与文化的长期积淀略有贡献。在体例上，丛书将不拘一格，既要推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著述，亦要译介国外优秀的学术著作；就范围而言，文学、历史、哲学固是题中应有之义，学术、教育、思想亦是重要背景因素，至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鲜活的社会科学内容，也都在“兼容并包”之列；就文体而言，论著固所必备，随笔亦所欢迎；至于编撰旧文献、译介外文书、搜集新资料，更是我们当学习德国学者，努力推进的方向。总之，希望能“水滴石穿”、“积跬步以致千里”，经由长期不懈的努力，将此丛书建成一个略具规模、裨益各界的双边文化之库藏。

前言

一、瓦德西生平简介

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伯爵（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1832-1904），生于德国东部城市波茨坦的贵族家庭。外祖父和父亲均为普鲁士将军，受家庭熏陶，12岁即入学波茨坦军事学校，16岁被授予陆军中尉军衔，后在普鲁士炮兵部队服役。1866年任汉诺威总督参谋，1870年任普鲁士驻法国使馆武官，专事刺探法国军情，立下卓越功勋，并因此受到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首相俾斯麦和陆军总参谋长毛奇的赏识。普法战争爆发后，威廉一世将其召到身边任侍从副官。战后，在俾斯麦首相的提名下重返巴黎，任德意志帝国驻法使馆临时代办。但毕生尚武的瓦德西对此项任命公然表示了不满：“我是一名士兵——从身体到灵魂，都是如此，我根本不适宜做外交官。”不久，瓦德西奉召回国，如愿出任德国陆军第十军团总参谋长。1882年，瓦德西被毛奇任命为德国陆军军需总监。1888年，瓦德西正式接替毛奇出任德国第二任陆军总参谋长。

瓦德西执掌德陆军总参谋部后，致力于增强和平时期总参谋部在德国内政外交上的话语权。通过一系列权力运作，瓦德西成功提高了总参谋部的地位和影响力，并在其主导下实现了3年义务兵役制。此后，野心勃勃的瓦德西开始干预德国的外交政策。因其崇尚军国主义，认为德、俄两强必有一

战，鼓吹先发制人攻击俄国，与俾斯麦的等距离外交和维护德国发展的和平战略机遇期发生了激烈冲突。于是瓦德西利用新上台的威廉二世与俾斯麦的政见不和，积极拥护威廉二世推行侵略性的“世界政策”，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俾斯麦，并最终促使威廉二世解除了俾斯麦的帝国首相职务，但却未能为自己争得俾斯麦接班人的位子。

此后，瓦德西与威廉二世在德国防发展战略上产生重大分歧：威廉二世为争夺海外殖民地和世界霸权，主张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瓦德西认为建立海军花费巨大，并会削弱陆军总参谋部的地位和权力，而且德在海外势力的扩张势必然引发德英的正面冲突，因此强烈反对扩建海军。因为矛盾的不可调和，威廉二世遂于1891年解除了瓦德西的总参谋长职务。尽管如此，威廉二世仍十分欣赏瓦德西的才华，任命其为第九军团指挥官，1900年还将其晋升为陆军元帅。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德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北京的骚乱中被打死，外国驻华公使馆区被义和团包围。列强组织联军干涉中国，威廉二世提名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经多方做工作，终被各国接受。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一心渴求作战的瓦德西而言，早在其从欧洲出发之前，北京即已被占领。瓦德西从欧洲坐邮轮出发，经过两个月的航行于9月27日抵达天津，10月17日正式赴北京就职。为增加德国在中外议和谈判中的筹码，瓦德西先后组织了对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的侵略。1901年6月解职离任，取道日本回国。1904年病逝。

二、瓦德西与赛金花

长期以来，一直流传着瓦德西与已故清政府驻德公使洪钧的小妾赛金花的风流韵事，并且曾经在中国的史学界引发了较大的争议。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1901年4月17日夜間，作为八国联军司令部的仪鸾殿因厨房失火，延烧至前后殿、配殿，参谋长施瓦茨霍夫被烧死，瓦德西本人闻警撤出，幸免

于难，但衣衫不整，极为狼狈。²大火以后，北京的街头巷尾出现了一种流言：瓦德西逃出火场时还挟着一个女子——已故状元洪钧的小妾、时为京师名妓的赛金花。据传，这位“赛二爷”（因其好与人称兄道弟，故得此雅号）同68岁的“瓦帅”“过从甚密”，瓦则对她“言听计从”。他们的交情对遏制洋兵暴行、保护京华名胜和推动辛丑和议起了特殊作用。这类说法越传越神，以致产生了一桩中国近现代史上扑朔迷离的“瓦赛公案”。

能够支撑上述说法的主要论据有二：

一是刘半农、高鸿逵师生二人采访晚年赛金花所写的《赛金花本事》。赛金花承认“同瓦以前可并不认识”，于“洋兵进城”后方在德军兵营与瓦相识，“越谈越高兴，很觉投缘”，瓦“当下就留我一同吃饭”，“随着便拿出来两套夹衣服，都是青缎绣花的；又取出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着一千块钱，都是现洋”，“一直待到天黑，瓦德西很舍不得叫走，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能常常来他营里，又亲自把我送出来多远，我俩才握手而别。从此以后，差不多每天都派人来接我，到他营罩一待就是多半天。很少有间断的日子。”应瓦的请求，赛帮助德军解决粮草军需困难，又找女人供德军消遣，因此受到瓦的赏识。有了这层关系，赛便劝瓦下令禁止烧杀和抢劫文物，并为慈禧太后求情：“害死你们公使的不是太后，是义和团。她整天价住在宫里，又不常出来，怎么能晓得外边的事？”但赛对仪鸾殿失火当夜与瓦共寝一室却矢口否认，“这简直是污蔑我，骂我。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间的关系，却是清清白白；就是平时在一起谈话，也非常的守规矩，从无一语涉及过邪淫。”瓦回到德国后，“还连着给过我几封信。我都是托一个留德的学生替我答复；因我只能说德国话，不能执笔写文。后来那个学生离开了北京，无人代我写信了，渐渐的音问遂疏。”³

二是曾繁的《赛金花外传》。关于赛、瓦相识时间，赛改称是早在她随洪钧出使柏林“那年结识了瓦德西将军，他和洪先生是常常来往的。故而我们也很熟悉。外界传说我在八国联军入京时才识瓦德西，那是不对的。”⁴八国联军进城后，赛向德国士兵“又问及瓦德西将军，当时我是不知道瓦德西是联军主帅的，那群兵听说我认识瓦德西将军，登时便敛容行礼，说要回

去报告主帅，便走了。”随后赛与瓦的交往，与《赛金花本事》所述无太大出入。

正因为有上述著书的佐证，20世纪30年代掀起了“赛金花热”。据《申报》通讯，各报不逾20日，必见一次赛的消息。特别是樊增祥的前后《彩云曲》和曾朴的《孽海花》将瓦赛交往描述得活灵活现，抓住了大众心理，迎合了市场需要。社会各界对赛氏褒贬不一，但舆论大多为溢美之词。诸如“光荣”的、“关系中国一段兴亡史实之有名女子”；“设非有赛其人”，则京师名胜，“亿民百官，千娇万丽，俱遭毒屠与奸淫”，故她“在晚清史上同叶赫那拉可谓一朝一野”，等等。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从现存史料来看，瓦德西与赛金花的交往纯属子虚乌有。

第一，赛金花说她在八国联军入京后即与瓦德西“相识”或“重逢”一事纯属虚构。根据瓦《回忆录》，他是在当年8月23日取道意大利热那亚港口开始远洋航行，直至10月17日才进入北京的，而此时距北京沦陷之日（8月14日）已有65日之久。这个“时间差”，让瓦赛“私情”和制止联军暴行的故事不攻自破。

第二，根据戏剧学家齐如山所作《关于赛金花》，他当时在李鸿章官邸帮忙做德文翻译，与一些德国军人和赛金花都相熟。他曾在紫光阁和瀛台见过赛和德国下级军官厮混，曾见到瓦德西走过，他走出去和瓦闲谈了几句，但赛没敢出头。齐如山还批评赛不但不爱国，更是卖敌求荣，说他不止一次看到赛金花陪德国军人骑马游前门大街，甚至有一次赛指着城区对德国军人说：“这都是我们的占领区！”⁵

第三，根据梦惠草堂主人丁士源在《梅楞章京笔记》中的记载，联军进京后，德军翻译葛麟常到赛金花妓所吸食鸦片，所以京中人士若受德兵骚扰，常托赛求葛帮忙，赛自己也求葛带她到中南海一游，葛答曰：“瓦德西大帅于南海紫光阁办事，军令森严。吾辈小翻译不能带妇女入内。”恰巧丁士源也在赛寓，于是葛转托丁帮忙。丁答允，但条件是赛须着男装。于是赛金花女扮男装，随丁乘马到中南海。至景山三座门后，受守门美军询问，至

团城，又有法兵查问，至南海大门，德军把守，丁告以谒瓦帅，德兵回以瓦帅外出，参谋长同行，因此不便入内，退返赛寓。回来后，丁把此事告诉帮助洋兵处理尸体掩埋工作的钱塘钟广生及浏阳沈荃。没有想到，“钟、沈退回自室，逐各戏草一稿，一寄上海《游戏报》李伯元主笔，一寄上海《新闻报》张主笔，谓赛金花被召入紫光阁，与瓦德西元帅如何如何，说得活现逼真，因此，瓦德西回国后发表《剿拳日记》（按：实名《拳乱笔记》）以反证之。妄人又构《孽海花》一书，蜚语伤人，以讹传讹，实不值一笑。”⁶ 丁士源是带赛入中南海的当事人，彻底否定了赛瓦公案存在的真实性，并指出了上海报刊传媒热炒赛瓦桃色新闻，就是谣言的来源。

第四，赛在口述历史时漏洞百出，如自称经瓦德西介绍结识被刺杀的克林德公使的夫人，说其“已50多岁”，但事实上这位公使夫人当时年方30。在接受《申报》采访时，赛称“与瓦德西住在仪鸾殿，共四个月，他走的时候要带我回德国去，我不愿意。”⁷ 这与她此前否认与瓦有过密交往自相矛盾。

第五，瓦德西的《回忆录》从头至尾未曾提及过赛金花，倘若二人关系亲密，在其私人日记当中，自然能够寻得一些蛛丝马迹。因此，《回忆录》以“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方式反证了赛瓦公案真相的另一面。

三、关于《瓦德西庚子回忆录》

《瓦德西庚子回忆录》系全文摘录瓦德西三卷本《回忆录》（Denkwürdigkeit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Alfred Grafen von Waldersee）第三卷第十二章“中国篇”，时间跨度始自1900年8月7日瓦接受德皇威廉二世电旨任命“八国联军总司令”，迄于1901年11月23日瓦回国后向德皇威廉二世所作书面报告，⁸ 共收录瓦日记、笔记、奏议、函电、报告，德皇威廉二世的函电、谕旨及其他函电150余件。《庚子回忆录》不仅记载了瓦在华期间的个人活动和感受，对八国联军侵华行为亦有较客观的描述，还记载了瓦与德皇威廉二世前后互动、与八国驻华公使和将帅协调磋商

和与清廷议和谈判的有关记录，真实再现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争夺在华利益中产生的尖锐矛盾：英、俄在撤兵议和问题上的斗争，日、俄在争夺中国东北势力范围上的纷争，英、法在争抢两广势力范围上的矛盾，德国在山东问题上与列强的利益冲突，等等。比较值得一读的是，瓦在谈判过程中对李鸿章充满了不信任，认为列强应共同对华交涉，不能单独谈判，以取得最大利益，而李鸿章则尽量想与各国单独接触，以利用列强互不信任的心理，减少中国的赔偿，事实上李鸿章已成功与俄国开始了谈判。由此看来，李鸿章似乎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只是后来事态的发展没能如李所愿。作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表，瓦在回忆录中对八国联军在华侵略行径和对中国人民实施的烧杀抢掠进行了苍白的辩解，但却无意中将八国联军的暴行暴露无遗，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在“拳民运动”中表现出了反抗外来侵略的“好战精神”，并对中国珍贵物品被抢被毁表示遗憾，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基督教徒想象的幻灭，是自三十年战争和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劫掠。因此，《庚子回忆录》对研究义和团运动具有较强的史料性。此外，《庚子回忆录》还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记载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中国风俗习惯和社会发展，如服饰饮食、兴趣爱好、宗教信仰、殡葬习俗、家庭生活等，对更全面地了解近代中国社会风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上世纪二十年代，我国著名旅德音乐家、革命家王光祈⁹曾经将《庚子回忆录》译成中文，题名《瓦德西拳乱笔记》，由上海中华书局于1928年印行。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义和团》第三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曾录入该书大部分章节，仅删去最后一章瓦德国游历日本和归国的记载。200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根据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的印本，改为简体横排，纠正了少数明显的讹字，并增配了一些历史照片。2009年，中华书局在1928年版本的基础上，将该书重新整理出版，对目录和正文进行了统一，并增加了外文索引。

尽管瓦德西的此部笔记已多次重版和再版，但在译者看来，直至今日依然有出新版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原因主要有三：其一，王光祈翻译成书时间为1928年，尽管上海书店出版社和中国书局在重版时对不甚适合现代读者阅

读习惯的体例、版本加以修改，但总体保持原貌，书中语言仍为民国语体，以今日看来，虽简洁流畅，亦不失其雅致，但终究不是白话文体，对读者阅读带来一定不便；其二，原译本注解注释较少，许多人名和地名均照搬外文，缺少上下文的呼应和背景知识的介绍，对今天的读者全面理解作品造成一定的障碍，此后数版皆未在此方面加以很好的补充和完善；其三，各版本文字编排、设计均较为简陋，图片总量较少，质量亦较差，有失美感；其四，限于当时的翻译条件，原译本在个别之处与原文意义有所出入，虽然无伤大雅，但仍可做到尽善尽美。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不妥之处，热忱请专家和读者们批评指正。

秦俊峰

2013年1月20日

注释

¹ 参见本书1900年8月瓦德西所作日记。

² 参见本书1901年4月20日瓦德西向德皇威廉二世所作报告。

³ 参见刘半农/商鸿逵：《赛金花本事》，载孙希涛编：《清宫秘闻 清代后宫私生活实录》，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166页。

⁴ 参见曾繁：《赛金花外传》，大光书局，1936年版。

⁵ 参见齐如山：《关于赛金花》，载刘半农/商鸿逵：《赛金花本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196页。

⁶ 参见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1-490页。

⁷ 刘半农/商鸿逵：《赛金花本事》，第109页。

⁸ 瓦德西在回忆录的按语和注释中还掺杂了1902年以后所记内容。

⁹ 王光祈，1892年生于四川温江，1936年病逝于德国波恩。早年在中国大学攻读法律，同时任职于清史馆，并先后担任成都《四川群报》驻京记者和北京《京华日报》编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光祈参加游行并陆续写回有关报导50余篇。当年7月，与李大钊、曾琦等发起组织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并担任执行部主会。年底又在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支持下创建“工读互助团”。1920年，王光祈赴德国留学，研习政治经济。1923年改学音乐。1927年入柏林大学学习音乐学。1932年任波恩大学中国文艺讲师。1934年以《论中国古典歌剧》一文，荣获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位在西方获得荣誉的音乐学家。1936年，王光祈积劳成疾，突患脑溢血卒于波恩，时年44岁。王光祈一生

瓦德西庚子回忆录

辛苦工作，勤奋著述，在客居德国的十多年里，除撰写、翻译了政论著作《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三国干涉还辽秘闻》等十余本外，还陆续写成音乐专著18本、论文40余篇。王光祈的音乐思想是主张发挥音乐的社会功能，借助音乐之力唤醒中华民族，完成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理想。